• 语言文学 •

《草堂诗余》考辨

谢桃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四川成都 610071

摘 要:南宋中期以来书坊编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盛行。该集今存分类本与分调本两系,版本众多而复杂,涉及诸多词学问题。文章从幸存最早之明初分类本提供的线索,推测宋本之原貌实为歌本。明初增修笺注本,原出宋季书坊所编,已是纯文学读本。明代中期词学家据分类本重编的分调本,则具有词谱的性质,可供填词者之用;其所选词调大都为宋人常用之调,所选之词乃当时流行的通俗作品,尤其不杂入声诗及其他韵文诸体,故对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关键词:《草堂诗余》;分类本;分调本;词选集;词调;歌谱;词谱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8505(2023)01 - 0029 - 10

doi: 10.12189/j.issn.1672 - 8505.2023.01.005

The Analysis of Cao Tang Shi Yu

XIE Tao-fa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07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 collection of selected lyrics compiled by the bookshop has been in vogue, known as *Cao Tang Shi Yu*. The editions are numerous and complex, involving many issues of lyricism. From the clues provided by the earliest preserved classified tex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t can be assumed that the edition in Song dynasty was originally a lyrics-based text. Newly annotated editio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originally compiled by Songji bookshop is a literary text.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lyricists recompiled the subtonal edition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ed edition, which had the character of word spectrum and could be used by lyricists; its selected lexical tunes are mostly those commonly used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words chosen are popular popular works of the time, especially those not mixed with poems and other rhymes, so it is of great lexical-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genre.

Key words: Cao Tang Shi Yu; classified text; subtonal edition; word selection; word melody; music of a song; term spectrum

若从文学社会学的视角考察广大文学爱好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情况,则优秀的通俗选本在文学的社会化过程中往往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诗经》曾是儒家提倡诗教的范本,而《唐诗三百首》自清代咸丰以来取代了各种唐诗选本成为广大读者喜好的读物,亦是学习古典诗体的范本。自《草堂诗余》传世后,逐渐取代了宋人编的各种词选本,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读物,亦是学习填词的范本。

收稿日期: 2022 - 06 - 12

作者简介:谢桃坊,男,研究员,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国学研究。

引用格式: 谢桃坊.《草堂诗余》考辨[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2(1): 29-38.

关于《草堂诗余》的著录,最早见于南宋藏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草堂诗余》二卷。"又小字注: "书坊编辑者。" "陈振孙之著录应在南宋淳祐九年(1249)后的数年间。书坊为刻印、售卖书籍的店铺,南宋时称为书棚,明清时称为书铺。明嘉靖安肃荆聚刻本《类选群类诗余》(《草堂诗余》)题"建安古梅何士信君实编选" ("]。建安,今福建福州,南宋时此地书坊甚盛。据此则题记,《草堂诗余》的编选者为何士信,字君实,广东梅县人,在建安书坊编选唐宋词为集。今传世之《草堂诗余》版本有两系: 以事物分类编的分类本和以词调为序编的分调本。何士信原编分类本已佚,今所传者元至正十一年(1351)双璧陈氏刊本,继有明代洪武二十五年(1392)遵正书堂刻本,明代嘉靖四年(1525)李谨本,嘉靖十七年(1538)陈钟秀校刻本,嘉靖安肃荆聚春山大字本。分调本最早者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敬刊本,其后有万历昆石山人本,万历李廷机刊本,沈际飞本,金溪胡桂芳本,汲古阁《词苑英华》本,乌程闵氏朱墨本,《四库全书》本。此外,各地书坊刊行之分调本极为杂多,为私塾学子通用。成都于民国时即有漱石斋精印之《分调类编草堂诗余》流行。

南宋书坊编辑的《草堂诗余》二卷虽然早佚,但从明代洪武本《增修笺注群英妙选草堂诗余》(此本乃据元代至正本重刊)²偶然留下的线索可以推测宋本之原貌。洪武本总目上标书名为《类选群英诗余》,总目后书牌为"洪武壬申遵正书堂新刊"。内文所标之分类细目却与总目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内标书名为《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兹将总目与内文分类之目列表如表 1。

		类选群英诗余	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					
卷数	分类	细目	卷数		分类	细目		
前集	春景	初春、早春、芳春、赏春、春思、春恨、春归、送春	前集	上卷	春景	晓夜、怀旧、春思、春情、春暮		
	夏景	初夏、避暑、夏夜、首夏、夏宴、适兴、村景、残夏		下卷	春景	春怨、春恨		
	秋景	初秋、感旧、旅思、秋情、秋别、秋夜、晚秋、秋怨			夏景			
	冬景	小冬、冬雪、雪景、小春、暮冬			秋景	秋思、秋怨、闺怨、秋闺		
后集	节序	元宵、立春、寒食、上巳、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 阳、除夕			冬景	冬雪		
	天文	雪月、雨晴、晓夜、咏雨		上卷	节序	上元、立春、寒食、上巳、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除夕		
	地理	金陵、赤壁、西湖、钱塘亭			天文气候	咏雪、咏雨、晴景、晓景、晚景、夜景、水阁		
	人物	隐逸、渔父、佳人、妓女	后集		人物	隐逸、渔父、佳人、妓女		
	人事	宫词、风情、旅况、警悟			人事	宫词、宫春、闺情、风情、旅况、离别、感旧、警悟、庆寿、 自述		
	饮馔器用	茶酒、筝笛、渔舟、庆寿、吉席、赠送、感旧			饮馔器用	咏茶、咏酒、咏笛、咏筝、渔舟		
	花禽	花卉、禽鸟、落花、桂花			花柳禽鸟	梅花、梨花、荷花、桂花、落花、杨花、柳、草、咏燕、咏莺、 桂鹃、孤鸿		

表 1 洪武本《草堂诗余》总目与内文分类之目

从表1可见四类不同。第一,书名不同,总目所标非笺注本,内文则为增修笺注本,当是明初书坊据旧本刊刻时本无总目,而临时取他本之总目加上去,以致与内目不同。第二,类选本分为前集与后集两卷;笺注本分为四卷,为增修本。第三,两本分类细目全同者仅"人物"类;"节序"类亦基本相同,仅笺注本缺"清明"一目;其他各目则互有详略。第四,笺注本缺"地理"类,当是书坊翻刻时因粗疏而遗漏。这种不应出现的严重失误只有书贾刻书时未暇校勘,胡编乱造所致,而历代藏书家及研究版本的词学家却

忽略了。由此可得出的结论是:洪武本非出自南宋何士信编的原本。

宋人陈振孙著录之《草堂诗余》二卷,洪武误入之总目恰为二卷。总目标书名为《群英妙选诗余》乃据旧本添加"群英妙选"以利畅销,而又落去"草堂"二字;然而以事物分类编排却沿宋本之旧而有增损,以致后来明代中期出现的分调本词题亦沿宋本之事物分类细目。据洪武本误入之总目可作如下推测:宋本《草堂诗余》为前集与后集,共为两卷,以事物——春景、夏景、秋景、冬景、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将所选之词分为十一大类,再分细目。兹去掉洪武本新增与新添之调,宋本收127调,应补地理类二调,共129调,其中约七十余调为宋人常用之调,所收词人79家,词255首。

在宋词别集中以事物分类编排的有南宋初年赵长卿的《惜香乐府》九卷分为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和总词五类,北宋周邦彦词《清真集》分为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单题和杂赋六类。因此《草堂诗余》将所收录之词按事物而作更细致的分类编排乃是适应宋词流传之时尚,因它是属于歌本性质的。近世学者白敦仁判定宋本《草堂诗余》的性质时说:"大抵此书在宋代原为书坊编选以供瓦子艺人选歌之用。"[2]这个判断是很确切的。词是音乐文学,它必须人乐歌唱才能充分实现艺术效果。词的演唱是宋人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朝廷、官署、士大夫之家、瓦市、茶肆、酒楼、歌馆等处皆有演出场所,为社会各阶层群众所喜爱和欣赏,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3]。歌妓们演出时,为适应特定场所、时节的受众,如元日、中秋、春分、吉庆等,她们便选择相关的流行的词演唱。《草堂诗余》以景物、事物分类编选流行歌词,正是可供歌妓乐工们的选用的;当然,喜爱流行歌词的民众也会从文学角度去欣赏。歌妓和乐工对许多流行的乐曲——词调是很熟悉的,当选择到某歌词,便可按照其词调之音乐演唱。我们可称这种未附级燕乐谱字的歌词本为简易的歌本。这种歌本所收之词必须是流行的通俗的并为普通民众所喜爱的。宋季词学家沈义父说:

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好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甚至咏月却说雨,咏春却说秋,如《花心动》一词,人目之为一年景。又一词中颠倒重复,如《曲游春》云:"脸薄难藏泪。"过云:"哭得浑无气力。"结又云:"满袖啼红。"如此甚多,乃大病也。[4]

沈义父所举的《花心动》词为阮逸女作,收入《草堂诗余》春景类;《曲游春》为康与之的词。宋季词学家兼词人张炎说: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如"为伊泪落",如"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时得见何妨",如"又恐伊、寻消问息,瘦损容光",如"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5]266

张炎以为柳永和康与之写艳词可以不深究,而著名词人周邦彦词集也有一些浮艳之词,甚为惋惜。他所举的词句见周邦彦的《解连环》《风流子》《意难忘》和《庆宫春》,这四首词均为《草堂诗余》收录。关于节序词,张炎说:

昔人咏节序,不惟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应时纳祜之声耳。所谓清明"柝桐花烂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谢",若律以词家调度,则皆未然。[5]262-263

他所举的清明词是柳永的《木兰花慢》,端午词是吴礼之的《喜迁莺》,七夕词是柳永的《二郎神》,这三首咏节序的词,张炎以为率俗,但它们为民众喜爱,并全收入《草堂诗余》,而他所欣赏的很雅的节序词如周邦彦赋元夕的《解语花》、史达祖赋立春的《东风第一枝》等词,可惜"绝无歌者"。沈义父和张炎论词皆力主雅正,从他们对俗词的指责,可见这些俗词常为歌妓们演唱,并在民间有广泛的市场。《草堂诗余》正是这类通俗歌词的选本。

宋人何士信编辑流行歌词为什么取名《草堂诗余》呢?明代学者杨慎解释说:"其曰草堂者,太白诗名《草堂集》,见郑樵《书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怀故国之意也。曰诗余者,《忆秦娥》《菩萨蛮》二首,为诗之余,而百代词曲之祖也。"⑥这纯属臆测与附会。《忆秦娥》与《菩萨蛮》出现于北宋,并非唐代诗人李白之词,更非李白诗之余。文人以草堂为室名者甚多,而蜀中以杜甫营建之草堂著称。宋代某些词人对于词体起源已甚茫然,仅以为它是继唐代近体诗之后兴起的,故以"诗余"代称词体,如毛平仲的《樵隐诗余》、廖行之的《省斋诗余》、吴潜的《履斋先生诗余》、黄机的《竹斋诗余》,皆是词集。宋人是存在一种诗余说的,此说在南宋时大盛,故何士信所编词选以"诗余"为名。"草堂"是某些隐逸文人谦称所居室名,而具风雅之意。因此,这本流行之通俗词集被书坊文人冠以典雅的书名是甚为怪异的,也许又是为博得文人读者赏识所致。

关于《草堂诗余》的编辑时代,《四库全书》编者认为:"旧传南宋人所编。考王楙《野客丛书》作于庆元间,已引《草堂诗余》张仲宗《满江红》词,证'蝶粉蜂黄'之语,则此书在庆元以前矣。"[7] 查《野客丛书》卷二十四,王楙云:

《草堂诗余》载张仲宗《满江红》词"蝶粉蜂黄都褪却",注"蝶粉蜂黄,唐人宫妆"。仆观李商隐诗有曰:"何处拂胸资蝶粉,几时涂额藉蜂黄。"知《诗余》所注为不妄。[8]

王楙于《野客丛书小序》表明此著完稿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续补订正于嘉泰二年(1202)。其所见之《草堂诗余》确实在庆元之前已经流行于世。洪武分类本《草堂诗余》前集卷上于"春暮"下收有张元干(仲宗)《满江红·春晚》,继有晁补之(无咎)《满江红·春暮》。兹据嘉靖分调本《草堂诗余》卷三《满江红》调收三词,前两词即为张元干与晁补之的词,第三首为周邦彦(美成)词,题为"春闺",其词有云:"蝶粉蜂黄都过了,枕痕一线红生玉。"注云:

《苕溪丛话》云"蝶粉蜂黄都退了",人以蜂蝶时节都过,殊与下句不相属,兼卒章有"蝴蝶满园飞"相反。后见一相识云,"退"字,乃"褪"字,而蝶粉蜂黄乃当时宫中时妆。③

周邦彦此词与张元干、晁补之三词属"春暮"类词,分调本据分类本(当是完整之本)重编时保存了周邦彦之词及注语,而洪武分类本因是书坊刊印,遗漏了周词。王楙所见之《草堂诗余》原有周词,此词排在第三首,他因记忆偶误遂将"蝶粉蜂黄"之语误为张元干之词了。其偶误却证实了分类本《草堂诗余》在庆元之前已流行,并且附有词话。然而洪武分类本后集卷上"节序"内收入刘克庄(潜夫)两首《贺新郎》端午词。在刘克庄词集《后村词》中,第一首词题为"甲子端午",第二首题为"端午"。按第一首"甲子端午",为南宋景定五年(1264),此年下距宋亡仅十五年^回。若以分类本为景定五年之后所编,则王楙和陈振孙皆不可能见到此本。我们对这一矛盾的现象只能解释为在景定五年之后书坊对分类本进行增修笺注时收入刘克庄之词,但忽略在词下标明"新增"之词。

从上述可见,南宋中期书坊编的《草堂诗余》可从明初之刊本所提供的线索并参证有关资料见到其大致的原貌,而且是可以复原的。

自南宋中期《草堂诗余》盛行以来,书坊应曾多次重刊。我们从明初洪武本《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保存之总目,可见到在洪武本之前尚有《类选群英诗余》,这应是南宋书坊重刊《草堂诗余》时,它表明具"类选"的特点,又冠以"群英诗余",以表明此集是著名词人作品之汇编,以利于畅销。在此集之后继有书坊组织文人学者在《类选群英诗余》的基础上进行增修和笺注的工作,推出了《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从此本笺注后大量引用《花庵词选》之评语及《玉林词话》,可知其增修是在南宋淳祐九年

(1249)之后,因黄昇字叔晹,号玉林,又号花庵词客,他的《花庵词选》十卷,《花庵词选续集》十卷序于淳祐九年。此增修本于后集卷上选有刘克庄咏端午之《贺新郎》两词,其第一首原题为"甲子端午",此年为南宋景定五年(1264),则可证此集当编成于景定五年之后的数年间,距南宋的灭亡仅约十年了。宋亡后,此增修本至元至正三年(1343)始于庐陵泰宇书堂重刊。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明初洪武本即是据至正本刊行的,它很真实地保存了宋末书坊本的原貌。

陈振孙著录的《草堂诗余》为二卷; 南宋后期的《类选群英诗余》分前集和后集,亦实为两卷。《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前集分上下卷,后集分上下卷,实为四卷。此本版框高 198 毫米,宽 250 毫米;每半页 13 行,每行 23 字;字体近于楷书;词调名低四格单排,词上下段之间以白圈(〇)分隔,均同于宋乾道本《新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注释于句下以双行小字整齐排列,分类如"春景""庆寿",词调下标明"新增"或"新添";词后引用词话或笔记杂书;凡此均以黑框留白字标出,此同于宋代黄善夫家塾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由此可见此增修本之字体、款式均同于宋代通行之刊本,保存了宋本书的通行特色。

此本虽未标"类选"之名,但依照《类选群英诗余》之目录分类,而于细目略有增损,仍是严格的类编本。此本增修之词均于词调下标明"新增"或"新添",计新增之词调 41 调,词 99 首,涉及的词人 44 人。新增有北宋词人王安石、张先、周邦彦、王诜、贺方回、晁补之的作品,特别新增了南宋词人康与之、朱敦儒、史达祖、辛弃疾、陆游、陈亮、刘克庄和黄昇的作品。能较全面地体现宋词的时代文学意义。

何士信编的《草堂诗余》因属歌本性质,无须对词句作注释,增修本第一次作了详细的笺注。书坊文人在笺注时大量使用了某些词别集的注本。南宋初年傅干编的《注坡词》十二卷,对苏轼词作了全面注释。增修本《草堂诗余》对所选苏轼词的注释采用了傅干的注,如:前集卷下苏轼《贺新郎》注引杜甫诗、白团扇事、王衍事、李益诗、白居易诗、韩愈诗、皮日休诗,均同傅注[10]22-73;后集卷上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注引李白诗、《明皇杂录》、唐诗、谢庄《月赋》及"东坡自序",均见于傅注[10]31-32。增修本新增周邦彦词共27首,多为传世名篇如《瑞龙吟》《玲龙四犯》《丹凤吟》《浪淘沙慢》《西平乐》《瑞鹤仙》等词。对这些词注释则采用南宋嘉定四年(1211)陈元龙注的《片玉集》,如:前集卷上《瑞龙吟》注引《汉书》、柳恽诗、苏子美诗、李贺诗、李义山诗、杜诗、温庭筠诗、张景阳诗等全出自陈元龙注[11];后集卷下周邦彦《六丑》注引刘宾客诗、杜诗、李延年歌、《文选》、应璩诗、陈充诗、王介甫诗均出自陈元龙注[11]。然而其他宋词别集在宋代尚无注本,故增修本需对许多作品重新注释,例如柳永的作品皆是第一次为之注释的。在注释中不仅广泛引用大量的诗文及史书,还有稀见的典籍,例如《华阳风俗录》《香谱》《古今艺术》《金门事节》《神异经》《龙城记》《秘要经》等。我们纵观编者对许多词的第一次笺注,其学术水平并不亚于傅干和陈元龙,虽书坊刻印时偶有错字,却并不影响其为甚佳之词选集注本。

我们从王楙所见之《草堂诗余》本,可知其原附有词话,增修本则大量附录词话及词评,其所引用之词话及笔记杂书,计有《花庵词选》《雪浪斋日记》《能改斋漫录》《古今词话》《遁斋闲览》《冷斋夜话》《诗眼》《后山诗话》《西清诗话》《复斋漫录》《苕溪渔隐丛话》《温叟诗话》《曲洧旧闻》《诗话总龟》等,其引用得最多的是《苕溪渔隐丛话》和《古今词话》及最后新增的《花庵词选》之评语。例如前集卷上于张先《天仙子》词后附词话云:

《古今诗话》:"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 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 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高斋诗话》云:"子野尝有诗云:'浮萍断处见山影。'又长短句云:'云 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送过秋千影。'并脍炙人口,世谓张三影。"苕溪渔隐曰:"细味三说,当以《古今诗话》所载三影为胜。"[12]

此段词话皆引自《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增修本后集卷上于柳永《醉蓬莱》词后附《花庵词选》云:

永为屯田员外郎,会太史奏老人星见,时秋霁,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词臣为乐章。内侍属柳应制,柳方冀进用,作此词奏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怿。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复擢用。[13]

关于柳永此事,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与杨湜《古今词话》有极简略记述,以黄昇《花庵词选》所记为详。增修本的编者附录中大量的词话是经过认真选择的,以有助于对作品创作背景的理解。最引起笔者注意的是编者于某些作品附有按语,例如后集卷下欧阳修《玉楼春》词后编者按语引用司马樵《蝶恋花》和毛泽民《惜分飞》词云:"此二词话语皆祖六一翁用意。"后集卷下于鹿虔扆《临江仙》词后按语云:"周美成《西河》词云'烟月不知人事改'句变化出来。"后集卷下于康与之《喜迁莺•丞相生日》词后评云:"此词语意尽佳,惜皆媚灶之语,为(秦)桧相作耳。"后集卷上于周邦彦《玉楼春》词后云:"东坡《点绛唇•咏天台》云:'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盖全用刘、阮天台事也。今并附于此。"从这些按语,可见编者对唐宋词作极为熟悉,能见到某些作品的语意的艺术渊源,而且某些批评是很深刻的。

宋末书坊文人的《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在对原本《草堂诗余》的增修、笺注、增附词话、附加按语等方面均有创新意义,而且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和艺术鉴赏水平,因而是一部优秀的词选集。此集不是供一般歌妓乐工等艺人使用的,乃是为学习填词、解读唐宋词和欣赏词体文学而提供的文学范本,其重新编选使《草堂诗余》更具文学意义。此编在明代曾对词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助于词体文学在南宋灭亡之后因词乐的散佚而导致词体创作失去规范以及词成为纯文学形式时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继续发展。

明代著名散曲家陈铎(1454?—1507),字大声,长期居住金陵,同时喜好作词,曾以《草堂诗余》为文学范本与依次和作,集为《草堂余意》。陈霆纪述云:

江东陈铎大声,尝和《草堂诗余》,几及其半,辄复刊布江湖间。论者谓其以一人心力,而欲追袭群贤之华妙,徒负不自量之讥。盖前辈和唐音者胥以此,故为大力所不许。大声复冒此禁,何也?然以其酷拟前人,故其篇中亦时有佳句……凡此皆颇婉约清丽,使其用为己调,当必擅声一时……[14]365陈霆特举陈铎和《草堂诗余》冬景徐昌图《木兰花令》并评论:

"金稅瑞脑喷香雾。向晓寒多深闭户。窗明残雪积飞琼,风起乱云飘散絮。 锦幄细看霓裳舞。 小玉银筝学莺语。梅香满座袭人衣,谁道江桥无觅处。"此陈大声冬雪词也,寄《木兰花令》。论者谓 其有宋人风致。使杂之《草堂》集中,未必可辨也。[14]364

凡是和前人之作,虽然可达于工致,但毕竟有模拟之迹而乏创新意义。故陈铎和《草堂诗余》为陈霆所批评与惋惜。陈铎使用《草堂诗余》是洪武初年刊行的增修本,因陈霆的《渚山堂词话》完稿于嘉靖九年(1530),当时顾从敬编的分调本《草堂诗余》尚未问世。从此例可见分类本《草堂诗余》在明代甚为流行,以致明代文人由此本而认识唐宋词,并可以依其调并参考有关此类作品而填词,则此本既具文学范本的性质,又可作为词谱使用了。

=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敬新编的分调类编《草堂诗余》刊行,特请著名学者何良俊为序。何良俊字元朗,华亭(上海松江县)人,嘉靖中以岁贡生人国学,授南京翰林院孔目,晚年居住苏州,著有《柘湖

集》二十八卷及《四友斋丛说》等。何良俊在序言中第一次阐释"诗余"之义:

夫诗余者, 古乐府之流别, 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诗亡而后有乐府, 乐府阙而后有诗余, 诗余废而后有歌曲。大抵创自盛朝, 废于叔世。元声在则为法省而易谐, 人气乖则用法严而难叶, 兹盖其兴革之大较也。然乐府以皦径扬厉为工, 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即《草堂诗余》所载, 如周清真、张子野、秦少游、晁(晏) 叔原诸人之作, 柔情曼声, 摹写殆尽, 正辞家所谓当行、所谓本色者也。第恐曹、刘不肯为之耳, 假使曹、刘降格而为之, 又讵必能远过之耶! 是以后人即其旧词, 稍加隐括, 便成名曲, 至今歌之, 犹耸心动听。呜呼, 是可不谓工哉! [15]532-533

何良俊从中国音乐文学史的角度,认为古代诗乐散佚后而有汉魏的乐府歌辞,乐府之音乐散佚后而有词,故词为诗余。诗余便是元明以来散曲之源。这样的解释,否定了词为唐代近体诗之变体,但见到了词在中国音乐文学发展中的意义。他认为某音乐元声元气之存在,其配合之歌辞便易协律;如果歌辞与音乐分离之后,则法度虽严而非音乐文学了。词体在明代的情况正是与音乐分离后的纯文学形式了。关于词体文学风格,他从《草堂诗余》所录周邦彦等婉约词人的作品归纳为"以婉丽流畅为美",并以为是宋词的本色,这体现了明代词人对词的体性的基本认识。关于汉魏乐府诗,钟嵘《诗品》对曹植与刘桢的评价极高,以为"孔氏之门如用语,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16]。何良俊认为,曹植与刘桢诗歌的风格与词的体性迥异,如果这两位诗人作词,未必能达到周邦彦等人的艺术成就。这揭示了词作为时代文学的特质。因此,明代文人如果学习《草堂诗余》是可能创作出感人的歌词的。当词乐散佚之后,词史的线索已经模糊。何良俊对词体的认识,在明代词学家中是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关于新编《草堂诗余》的编者,何良俊介绍说:

顾子,上海名家,家富诗书,代传礼乐。尊公东川先生,博物洽闻,著称朝列。诸子清修好学,绰有门风,故伯叔并以能书,供奉清朝;仲季将渐以贤料起矣。是编乃其家藏宋刻本,比世所行本,多七十余调,是不可以不传。[15]533

这对顾从敬及其家学颇有溢美之词,而所称其所编乃出自家藏宋刻本更属伪托。然而他对顾从敬所编《草堂诗余》的重要词学意义却并未指出。顾编《草堂诗余》的全称应为《分调类编草堂诗余》,他是依据类编本而重新采取分调编排作品,将分类之目系于词题之下,而且增加了词调与作品,使此词选集以新的风貌流传,不仅为词体文学创作提供范式,而且为词体格律提供了规范。兹将此编与宋本及分类本《草堂诗余》比较如表 2。

₩ 5 -#-	八平	词调			词	词人	
版本	分卷	总数	多余数	总数	多余数	总数	多余数
宋本	2	129		255		79	
分类本	4	170	41	354	99	123	44
分调本	4	178	49	401	146	117	38

表 2 宋本、分类本、分调本《草堂诗余》比较

宋人何士信编的《草堂诗余》在宋亡之后已佚,但从宋末书坊据何士信本增修笺注之本,即明初翻刻的元代至正本所留下的线索,仅可推测原本之大致面貌。顾从敬新编所依据资料出自《增修笺注群英妙选草堂诗余》。分类本将原宋本的前集与后集两卷,改为前集卷上、卷下,后集卷上、卷下,共四卷;分调本则直接分为四卷。分类本按事分类为春景、夏景、秋景、冬景、节序、人物等类而分别录词;分调本则

汇集作品,以词调字数之多少依次排列,将事类细目改为词题,系于词调之下。分类本对作品涉及事典及出处之文字皆作注释,而于词后附录词话或按语;分调本则去掉注释而将附录之词话及按语保留。关于词话,分调本全抄分类本,例如:苏轼的《卜算子·孤鸿》分类本于词后附录"山谷云"、《苕溪渔隐丛话》、鲖阳居士评语;晏殊《浣溪沙·春恨》附录之《渔隐丛话》;晏几道《鹧鸪天·劝酒》附录之《后山诗话》;秦观《千秋岁·春景》附录之《后山诗话》《冷斋夜话》;无名氏《鱼游春水·春景》附录之《复斋漫录》《古今词话》。分类本原附宋末书坊编者关于某些词之按语。例如欧阳修《玉楼春·妓馆》按语引司马樵与毛泽民词,评云"此二词结语皆祖六一翁词意";秦观《鹊桥仙·七夕》按语谓化七夕节俗为"神奇":分调本直录这些按语,似已出者。黄庭坚《阮郎归·咏茶》分类本引《古今词话》后加按语云:"愚关(观字之误)《山谷集》有一曲咏煎茶亦名《阮郎归》。"分调本直录此则按语改所误之"关"字为"观",则"愚观"竟变成了顾从敬自己的评论了。和凝《小重山·宫词》分类本编者于词后附一则按语,特标明"愚按",分调本直录此则按语,亦特加上"愚按"以表明为己出者。以上两例说明顾从敬不仅全抄录分类本按语,并且盗窃了原编者之按语,毫无顾忌。分类本新增周邦彦之词甚多,例如《瑞龙吟》《玲珑四犯》《丹风吟》《浪淘沙慢》《法曲献仙音》《过秦楼》《侧犯》《塞翁吟》《拜星月慢》《宴清都》《华胥引》《霜叶飞》《蕙兰芳引》《红林擒近》《六幺令》《蝶恋花》《南乡子》《绕佛阁》《尉迟杯》《夜飞鹊》《水龙吟》等词,皆为分调本录入。

顾从敬新编《草堂诗余》补入了一些词调和名篇,但并非如何良俊所言比宋本增加七十余调,实际仅增加四十九调。例如新增加的名篇有柳永的《雨霖铃·秋别》和《戚氏·秋夜》,特别新增了范仲淹的名篇《苏幕遮·怀旧》《渔家傲·秋思》《御街行·秋日怀旧》。他还据洪武本所附《类选群英诗余总目》补录了分类本遗漏的"地理类"的名篇如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柳永《望海潮·钱塘》、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刘过《贺新郎·游湖》和《唐多令·武昌》;此外,还补入了两首很特别的词:黄庭坚《瑞鹤仙·醉翁亭》(隐括)和宋谦父的《秋霁·隐括东坡前赤壁》。这使收录作品更丰富,能更全面地体现宋词的艺术特色。

《分调类编草堂诗余》在词学史上最重大的意义是对词体的分调与对词调的分类。此编四卷:

卷一,小令,计三十七调,自二十七字的《捣练子》适于五十八字的《小重山》。

卷二, 中调, 计三十九调, 自六十字的《一剪梅》 适于九十一字的《夏云峰》。

第三、四卷,长调,计一百零二调,自九十二字的《东风齐著力》,这于二百一十二字的《成氏》。在词体作品编集方面,其体例是首创的,并含有深刻的词学学理意义。关于词集编纂的分调,宋人的词别集分调汇列作品,其分调最初是任意的,如《珠玉词》《张子野词》《六一词》《小山词》等,多为小令,分调尚无原则。自长调慢词发展以后,如《东坡词》《山谷词》《淮海词》《芦川词》《石林词》《稼轩词》等,皆先依次录长调,继列小令。以上两种情况,说明宋代词人虽然对词调熟悉,但尚无较为合理的分类观念。顾从敬第一次采用以词调之字数为标准进行量化而依次排列,为词学界提供了词调分类的标准。此后,张綖编著的《词余图谱》、赖以邠的《填词图谱》、万树的《词律》和王奕清等编的《词谱》均按此标准排列。这种对词调的量化是词学发展至明代中期由顾从敬创制而形成的,所以《分调类编草堂诗余》并非宋人旧本而是新编的。顾从敬由对词调的量化考察,进而对词调作量化的分类,即将众多的词调按量化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清初词学家毛先舒依据《分调类编草堂诗余》概括出词调分类具体标准为:"凡填词,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自五十九字始至九十字止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者俱长调也。此古人定例也。"[17] 万树和王奕清等词学家虽然接受了量化排列词调的意见,但反对以量化分调类。近世词学家主张按宋人词乐观念将词调分为"令、引、近、慢",然而因词乐的散佚,对这四个音乐概念未能确切理解,更导致学理的紊乱。词调按字数的规定,从最短的到最长的,它们体制的宏细与容量的大小是存在很大

差别的。按词调字数的多少,而考察每调的长短,将它们进行大致的分类,这有助于我们对词调体制结构的认识,从而探讨词体的艺术表现特点,亦可为填词者提供词调选择的导向。

上述三种《草堂诗余》,版本相异,体制不同,但共同点是所选的作品大都是通俗的流行的歌词,其中多为名篇,可以体现宋词基本的艺术特点。它们所选的词调甚为丰富,而且概括了宋代流行的词调,以调存词。它们的社会效应是不同的,何士信所编宋本,具备歌本的意义,可供艺人各种场合演唱时使用。宋末书坊编的增修笺注的分类本,已是文学的范本。顾从敬编的分调本则最适用于词体成为纯文学形式时填词者作为词谱使用,可依照某调的作品去体会其声韵格律而进行创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何士信及宋末书坊等文人编集唐宋词选本时,对词体是有明确认识的,故他们收入的众多词调里均未杂入齐言的声诗及其他诸种韵文体式。我们反观五代赵崇祚编的《花间集》、宋人曾慥的《乐府雅词》和黄昇的《花庵词选》等集却混入了不少的声诗,而词学家万树的《词律》与王奕清等的《词谱》除了混杂不少声诗之外,又混入了大曲及元曲,因而它们的编辑体例是存在严重错误的,而诸本《草堂诗余》却无此种常识性的错误,体现了很纯正的词学观念,故在宋以来诸多词选中尤为可贵。

自顾从敬《分调类编草堂诗余》四卷本行世后,继有杨慎与沈际飞的评点本,又有陈继儒的重校本,它们卷数有异又新增一些作品,但仍以顾氏原本较为通行,它取代了分类本,深受广大文学爱好者欢迎,亦为学习填词的首选的参考书。清代初年朱彝尊历评词选集云:

古词选本,若《家宴集》《谪仙集》《兰畹集》《复雅歌词》《类分乐章》《群公诗余后编》 《五十大曲》《万曲类编》及草窗周氏《选》,皆佚不传。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 守为《兔园册》,无惑夫词之不振也。[18]

"兔园册"为唐太宗之子李恽命僚佐所编,作为应试科目的启蒙课本,朱彝尊慨叹众多宋以来词选集皆佚,唯有《草堂诗余》在诸选集中品格最低下而最流传,它竟成为数百年来学者们作为词学启蒙的课本。他并未深究原因,而从雅正的观念重新编选词集为《词综》,以作为复兴词学的文学范本。虽然《词综》的确在复兴词学的过程中产生了作用,但不能代替《草堂诗余》作为启蒙课本的意义。清代初年词学家毛奇龄记述:"张鹤门词以《草堂》为归,其长调绝近周、柳,虽不绝辛、蒋,然亦不习辛、蒋;此正宗也。"[19] 此例可说明当时有词人学习《草堂诗余》,特别注重学习柳永与周邦彦之词,将《草堂诗余》作为词谱使用。张鹤门依调作词五卷,毛奇龄肯定其所学者为词家正宗。近世词学家况周颐从文学观念评论《草堂诗余》,并不以为其品格低下,他说:

唯《草堂诗余》《乐府雅词》《阳春白雪》较为醇雅。以格调气息言,似乎《草堂》尤胜。中间十之一二,近徘近俚,为大醇之小疵。自余名章俊语,撰录精审,清雅朗润,最便初学。学之虽不能至,即亦绝无流弊。于性情、于襟抱,不无裨益,不失其为取法乎上也。[20]

此评价是很公允的,特别强调了初学填词者学习《草堂诗余》是最佳的途径。1949年词学家陈匪石尚认为"盖《草堂诗余》一本,在明流传极盛,填词者奉为圭臬","然所选各词,皆系宋以前作且仍系雅词,足资诵习"[21]。我们纵观宋代以来,各种的唐宋词选本,皆以词人为单位选录作品,惟有《草堂诗余》一是以事分类,一是以调分类选录作品的。当分调本流传以后,取代了分类本而盛行不衰,可引导初学者建立词调观念,学习名篇,并由此而进入词学的创作与艺术欣赏的境界。1948年冬天,笔者尚是少年,偶然在成都春熙路地摊上购得成都漱石斋线装精印的《分调类编草堂诗余》,遂为唐宋词艺术之华丽精美所感染,在刘杲新先生指导下诵读学习,这竟成为笔者此后走上志于词学研究的契机。故笔者深感《草堂诗余》对初学者认识词体艺术的独特的启迪意义。

注释:

-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武英殿聚珍本。
- ② 洪武壬申遵正书堂刊本《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续修四库全书》第17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14年。元代至正刊本残缺甚多,为日本狩野直喜收藏;参见日本清水茂《日本昭和五十五年影印元至正癸未庐陵泰宇书堂刻本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后记》、《杨升庵从书》第六册,第977—983页,天地出版社,2022年。
- ③ 顾从敬编《草堂诗余》卷三、《四库全书》第1489册,第574页,按注引《苕溪渔隐丛话》,今本无此则词话。

参考文献:

- [1] 元刻元印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提要[M]//赵万里. 校辑宋金元人词. 上海: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1.
- [2] 白敦仁. 批点草堂诗余后记[M]//杨升庵丛书 第六册.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22: 984.
- [3] 谢桃坊. 宋词演唱考[M]//宋词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346.
- [4] 沈义父. 乐府指述[M]//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81.
- [5] 张炎. 词源 卷下[M]//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6] 杨慎. 批点草堂诗余序[M]//杨升庵丛书 第六册.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22: 616.
- [7] 草堂诗余提要[M]//四库全书 第1489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31.
- [8] 王楙. 野客丛书卷二四[M]//四库全书第853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746.
- [9] 刘克庄. 后村词笺注[M]. 钱仲联, 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56.
- [10] 傅干, 原注. 傅干注坡词[M]. 刘尚荣, 校证. 成都: 巴蜀书社, 1993.
- [11] 陈元龙, 注. 片玉集[M]//乔大壮手批周邦彦片玉集. 济南: 齐鲁书社影印本, 1985.
- [12] 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 前集 卷三七[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252 253.
- [13] 黄昇. 花庵词选 卷五[M]//四库全书 第1489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357.
- [14] 陈霆. 渚山堂词话卷二[M]. 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5] 何良俊. 草堂诗余序[M]//四库全书 第1849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16] 钟嵘. 诗品[M]//何文焕, 辑. 历代诗话.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7.
- [17] 毛先舒. 填词名解卷一[M]//查培继、编. 词学全书. 北京: 中国书店影印本、1984.
- [18] 朱彝尊. 词综发凡[M]//词综.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75: 8.
- [19] 毛奇龄. 西河词诗卷二[M]//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579.
- [20] 况周颐. 蓼园词选序[M]//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017.
- [21] 陈匪石. 声执卷下[M]//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4960.

[责任编辑 李秀燕]